

淺析《華夷圖》與《歷代地理指掌圖》中 《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之間的關係

成一農

內容提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首先討論了與《華夷圖》和《歷代地理指掌圖》有關的一些問題，然後分析了兩者之間的關係，認為《華夷圖》可能來源於《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或者《歷代地理指掌圖》更早的一個版本，但兩圖與賈耽的《海內華夷圖》應當沒有直接的關係。

關鍵詞：華夷圖 歷代地理指掌圖 傳統輿圖 海內華夷圖

關於《華夷圖》的來源，以往已有學者進行過研究，其中用力最深的當屬曹婉如先生，她注意到了《華夷圖》與《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之間的相似，在《〈歷代地理指掌圖〉研究》^①一文中提到兩圖的注記大致相同，認為兩者在反映賈耽《海內華夷圖》的方面各有所長，其中《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對於河流、山嶽、湖泊等的表示上較為粗略但長於沿革。在《有關華夷圖問題的探討》^②一文中曹婉如先生進一步對比了《華夷圖》中十八條文字注記與《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文後十九條注箋的異同，認為：兩者基本相同，但仔細分析，可以認為《華夷圖》的注記來源於《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的箋注，並改正了其中的一些錯誤。除了曹婉如先生之外，孫果清在《歷代地理指掌圖》一文中認為兩者“所依據的是同一幅圖。進一步講，均是參考了唐代賈耽的‘海內華夷圖’”^③。

總體而言，以往的研究雖然認為《華夷圖》與《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存在聯繫，但認為兩者之間沒有直接關係，而都來源於唐賈耽的《海內華夷圖》。上述觀點依然有討論的餘地，不過首先需要澄清與《華夷圖》和《歷代地理指掌圖》相關的一些問題。

一、《華夷圖》

宋代除了現在保存在西安的這幅《華夷圖》外，還曾經存在有其他一些《華夷圖》，如樂史（或樂黃目）所編的《掌上華夷圖》一卷^④。又何遠在《春渚紀聞》卷九

“趙水曹書畫八硯”中記“水曹趙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遠先博士爲徐州學官日，趙獻狀開鑿呂梁、百步之嶮，置局城下，最爲周旋。其《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半，字如蠅頭，而體制精楷。蘇州張珙妙於刊鑱，三年而後成，甚自秘惜，不易以與人”^⑤。關於何遠和趙竦的生平記載不多，何遠的父親，也就是文中提到的“遠先博士”何去非，任徐州學官的時間是在元祐年間或者之後不久；趙竦，按照《宋史·河渠志》中的一條記載，其是在紹聖四年（1197）曾任水部員外郎^⑥，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四記“（元祐六年正月）戊寅，京東轉運司言：‘宣德郎趙竦請修徐州百步、呂梁’”^⑦，正與《春渚紀聞》相合。因此這一《重定華夷圖》當大致繪製於哲宗時期。由於這些《華夷圖》都已經散佚了，他們與我們今日所見《華夷圖》的關係，難以做出判斷。

《華夷圖》這一類型的地圖，在南宋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如《玉海》中記載爲：“乾道元年七月癸丑晚，御選德殿。御坐後有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爲兩行，以黃簽標識職位、姓名。上指示洪適等曰：朕新作此屏，其背是《華夷圖》，甚便觀覽。卿等於都堂亦可依此。”^⑧這一記載還有一旁證《鶴林集》卷十九“論中原機會不可易言乞先內修政事劄子”中記“孝宗思其難不惟其易，躬其勞不於其逸，故置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⑨。可見，《華夷圖》在當時處理國家政務中也是一種參考資料，具有極強的實用性。

當然，其也是當時士大夫瞭解天下大勢、地理形勢的輔助，如李綱在《梁溪集》卷二十四“次雷州”一詩中記“《華夷圖》上看雷州，萬里孤城據海陬。萍跡飄流遽如許，騷辭擬賦畔牢愁。滄溟浩蕩烟雲曉，鼓角淒悲風露秋。莫笑炎荒地遐僻，萬安更在海南頭”^⑩。《朱子語類》即“先生謂張侔云：向於某人家看《華夷圖》，因指某水云：此水將有人淮之勢。其人曰：今其勢已自如此。先生因言河本東流入海，後來北流，當時亦有填河之議，今乃向南流矣”^⑪。此外《鶴林玉露》卷三中記“（趙）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筭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這段文字反映了當時《華夷圖》在士大夫日常出遊中具有一定的實用性，這是中國古代地圖這一方面少有的文字資料。不過如果從攜帶的角度來說，從石板上拓印的紙本或者絹本地圖似乎應該更便於攜帶和使用，但是朱熹依然要製作笨重的木刻地圖，這背後所反映的問題也是值得考慮的。

二、《歷代地理指掌圖》

關於《歷代地理指掌圖》的作者，雖然在歷史上存在爭論，但是現在絕大部分學者的意見已經達成一致，排除了蘇軾作爲作者的可能，認爲真正的作者應當是稅安禮^⑫。

該書最初刊刻的時間，大體都認爲是在北宋末年，如在譚其驤《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序言”中認爲“最早應刻於北宋末年”^⑬、“本書初版應刊成於北宋末政和、宣

和之際”^⑭。曹婉如《〈歷代地理指掌圖〉研究》中認為現存的宋本“除第四十四幅圖外，其餘皆出自北宋人之手……‘總論’部分肯定是宋人所撰，或者也是趙亮夫增補的”^⑮。郭聲波認為“舊板初刻於政和三年以前的可能性較大”^⑯，不過他在文中還提出“《指掌圖》編撰於紹聖、元符之際”，這一推測也有一定依據，南宋中葉的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記“《地理指掌圖》一卷，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刊，皆不著名氏，亦頗闕不備。此蜀本有涪右任慥序，言之頗詳”^⑰；清徐文靖所編《禹貢會箋·原序》中記“余家藏有《六經圖》《禹貢圖》一二而已，又所藏宋大觀中《地理指掌圖》，其中有帝嚳及堯《九州圖》《舜十二州圖》《禹跡圖》……”^⑱，似乎在清代還存有宋大觀本，也就是一個早於以往學者提出的政和、宣和初刊本之前的版本，當然這只是一條孤證。總體而言，《歷代地理指掌圖》初版最晚刊刻於政和、宣和之際，但該書最初編纂的時間應該更早一些。

該書文字材料的來源，郭聲波進行過詳細研究，認為“綜觀全書，即可發現大部分文字採自一些常見歷史、地理著作，有的甚至通篇照抄”^⑲，這一結論應當不誤。

該圖的繪製目的，主要是爲了讀史和瞭解天下大勢所用，這在作者自序中體現的非常清楚，即“古今輿地，披圖了然，如親履而目見之，庶乎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⑳。後人也有相似看法，如寧宗時人費哀在《梁溪漫志》中記：“今世所傳《地理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爲，自足以傳遠。”^㉑而且該圖在明清時期影響力是比較大的，很多歷史著作中都有所提及，如在關於《春秋》的各種注疏中多次引用到《指掌圖》，只要檢索一下《四庫全書》即可以得出這一結論。

最後一點是之前學者所未涉及的，就是《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很多地圖所繪的基本輪廓都是相似的，祇是根據需要增補了不同時期的不同內容而已，因此可以推測，稅安禮在繪製時很可能繪製或者參考了一幅基本的底圖，那麼這些地圖中的哪一幅最接近這一底圖呢？對比各圖，最爲有可能就是《太宗皇帝統一之圖》。

首先，該圖是所有地圖中繪製內容最少的，而且其中所繪內容絕大部分都出現在其他地圖中，最具有說服力的就是在幾乎所有時期的地圖中所出現的最為基本的政區都是相同的，即都是北宋時期的政區，也就是《太宗皇帝統一之圖》所表示的政區，只是在此基礎上疊加了不同時期特有的政區而已。

其次，《太宗皇帝統一之圖》雖然從圖名來看是北宋初年的政區疆域圖，但從政區來看，實際上表現的是北宋後期的政區，如“仙井”（宣和四年由陵井監改爲仙井監）、“南京”（應天府升爲南京是在大中祥符七年）、“北京”（大名府改北京是在慶曆二年）。該圖圖名是《太宗皇帝統一之圖》，這些內容顯然與圖名不符，但從《歷代地理指掌圖》大多數地圖所繪政區來看，這些地圖表現是基本政區都屬於宋代同一時期的，因此這再次說明《太宗皇帝統一之圖》的底圖應當是一張北宋時期的地圖。表示時間上在此圖之後的《聖朝元豐九域圖》未繪製絕大部分河流，《本朝化外州郡圖》增補了一些化外州郡，其基礎依然與《太宗皇帝統一之圖》相似。

最後，即使是後來補充的第四十四幅圖《聖朝升改廢置州郡圖》也是以此圖爲基

礎，只是省略了河流，重繪了邊界，添加了路而已。

綜合上述三點，基本可以認為《太宗皇帝統一之圖》可能是《歷代地圖指掌圖》各幅地圖中最接近底圖的一幅。

不過，《太宗皇帝統一之圖》與《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相比，存在兩處較大的差異，即遼東、朝鮮和西域部分，而且在整部《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祇有《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繪製有這兩個地區。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是在上文提到的底圖的基礎上增補了這兩個部分；二是上文提及的底圖是精簡《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的內容而成的，也即祇保留了圖廓、河道和北宋的政區，並刪除了遼東、朝鮮，精簡了西域部分（或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有着一個更為精簡的底本，《歷代地理指掌圖》是在這一底本基礎上繪製的）^②。

兩種可能性無論哪一種成立，這一底本的特點是黃河是慶曆八年之前的河道，政區則是北宋時期的政區，此後在不斷刻印過程中，由於是刻板圖中的地名刻印挖改調整為當時的地名，而河道則難以進行調整，這種困難不僅是刻板的問題，還有修改者的水平問題，所以今天保存的版本中就出現了河道與政區的矛盾。

三、《華夷圖》與《歷代地理指掌圖》中 《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之間的關係

下文以曹婉如、孫果清對《華夷圖》和《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之間關係的分析為基礎，進行進一步的解析。

第一，《華夷圖》繪製時是否參考了《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

關於這兩幅的繪製時間，《華夷圖》繪製於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1117—1125）間；《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如上文分析，刊刻時間大致也在同時，不過這是我們今天所見南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的情況，但是其繪製完成當更早一些，甚至按照郭聲波的分析可能存在一更早的版本。

不過，僅僅是對比《華夷圖》和東洋文庫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兩圖雖然相近，但似乎並沒有直接的傳承關係，因為《華夷圖》中陵井監尚未改為仙井監，其表示的時間似乎要早一些，由此可以認為其未參考東洋文庫本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所繪內容較《華夷圖》更多，如繪製有北宋的路、古今地名等，東南地區繪有“鑒湖”，海中增加了一些國名，不過這也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因為《華夷圖》中繪製有《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所沒有山脈和海南島，因此僅僅依靠這些難以判定兩圖之間的關係。

關於文字注記，曹婉如所言，《華夷圖》的文字注記應當參考了《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不過應當更為嚴謹的闡述為：可能參考了東洋文庫本《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或者與之有關的文獻材料。因為現存版本《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圖記中的錯誤，如誤將“西州”寫為“西氏”，可能是今天所存版本《歷代地理指掌圖》抄自某一更早版本或文獻時出現的錯誤，由此《華夷圖》的注記並不是對《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

錯誤的修正，而是與今日所見《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都源自相同的更早的版本或文獻。

此外，也是最為關鍵的是，《華夷圖》中基本不標注路名，但是在東部出現了“兩浙”，這顯然源自“兩浙路”，這個地名也出現在《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中，而且標注的位置也基本一致，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標注有北宋的各個路名，這似乎祇能解釋為《華夷圖》在摹繪某幅地圖時出現的失誤，但僅此而言難以肯定這幅地圖就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

問題到這裏並沒有結束，還需要注意另一點，即曹婉如先生注意到的兩者圖記大致相同，存在極大差異的就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箋注中“辨古今區域”的一節，在《華夷圖》的題記中進行了修改，主要是去掉了“古”的部分，不僅刪除了箋注開始部分“區域之興，古別九州，兩漢以十三州統治，晉分天下為十九州，唐分為十道，聖朝分為二十三路”，而且在後面的文字中也去除了“古”的內容。就地圖而言，《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與其箋注是符合的，即在圖中標示了古九州、漢十三州、晉十九州、唐十道、宋二十三路的政區；《華夷圖》也與其注記相符，沒有表示古代的部分。不過由此並不能簡單的認定《華夷圖》就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精簡的結果，因為也存在由《華夷圖》增繪為《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的可能，要作出判斷還需要結合其他證據。

就地圖形式而言，《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是符合常理的，即華夷的部分都敘述了歷史和現今（需要注意的是圖中標繪有夏國和契丹）的情況，可以認為是一幅歷史地圖。而《華夷圖》則比較奇怪，即圖中在中原地區，也就是長城、黃河以南標注的大多數都是北宋的地名，但在其外，也就是“夷”的部分很多都是歷史地名，甚至沒有標繪“夏國”和“契丹”，如果這幅圖是歷史地圖的話，那麼中原地區為什麼不標準歷史地名；如果這幅地圖體現的是“華夷”的話，那麼為什麼不將周邊的“夷”改為當時的“夷”，由此這幅地圖的定位就有些奇怪，繪製的目的似乎並不清晰。

就精簡的角度而言，從《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精簡為《華夷圖》的話，“華”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但“夷”的部分如果去除古地名的話所剩也就無幾，而繪圖者可能也疏於加繪當時遼和西夏的政區，而且由於兩者文字部分都記載有“宋分為二十三路，其四方番夷之地，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所以繪製者由此在“夷”的部分保留下了古地名而去除了今地名以符合這一圖記。而上文提及的不應該出現在《華夷圖》中的“兩浙”，也應當是對《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精簡的結果。

而從《華夷圖》增繪為《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的話，難度頗大，但也不是不可能，不過考慮“兩浙”的問題，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

綜上而言，對於兩者的關係，大致有兩種可能：一是，兩者雖無直接的繼承或者參考關係，不過都來源於相同的祖本，這一可能性並不能完全排除；二是，《華夷圖》可能源自我們今天所見《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或者《歷代地理指掌圖》）更早的一個版本（可能是譚其驤的等說的初刊本，也可能是更早的稅安禮的未刊本），在這一更

早的版本中“陵井監”尚未改為“仙井監”。兩者中，後者的可能性較大^②。

第二，曹婉如等認為這兩幅圖都來源於賈耽的《海內華夷圖》，這一觀點存在值得商榷之處。

以往學者的主要依據是認為兩者圖記和箋注中都提到“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列）其著聞者”以及圖中黃河下遊河道的走勢。但如果通讀《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中的箋注，這段文字之前為“本朝土宇與古齊盛，凡使者所部分為二十三路，具見於圖”（《華夷圖》注記中省略為“宋分為二十三路”），通讀這段文字，其涵義只是陳述周邊“四方蕃夷之地”時參考了賈耽的地圖。而且即使曹婉如的推斷是正確的，但是從圖中內容來看，四周的文字注記大部分應當是宋人所寫的^③，圖中的行政建置都是宋代的建置，此外對某些河道表述的也是宋代的情況，最為典型的就東京（開封）附近和河道（《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並未繪製），其向東南的兩支在唐代是沒有的，應該是宋代開鑿的惠民河和金水河。因此，即使以賈耽的《海內華夷圖》為底圖，那麼其採用也祇有地圖輪廓和部分河道的走勢。

曹婉如先生另外一項證據就是《華夷圖》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中黃河的河道應當是慶曆八年（1048）之前的唐宋河道，這點本身並無問題，但並不能用來證明其與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存在關係，因為也可能是參照了唐宋時期的其他地圖，因此這一點至多祇是一種旁證而不是直接證據。

另賈耽的《海內華夷圖》據記載寬3丈，長3丈3尺，比例尺是“一寸折成百里”，根據比例尺推算，該圖覆蓋的範圍東西應有3萬里，南北達3萬里以上，顯然這與《華夷圖》《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的覆蓋範圍存在很大的差異，此外賈耽的原圖即使不是計里畫方的也應該是有類似於今天比例尺的表述文字的。

此外，就繪製內容而言，如上文所述《華夷圖》很可能是改繪自《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且不說《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可能是根據一幅宋代的地圖為底圖繪製的，即使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或其精簡本）是《歷史代理指掌圖》繪製的底圖（參見上文），那麼其中繪製有很多唐代之前的歷史地名，而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則只是一幅唐代的地圖，並不是歷史地圖^④，兩者存在明顯區別。因此，《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不太可能與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存在直接聯繫，由此《華夷圖》也很可能與賈耽的《海內華夷圖》並無直接聯繫。

此外，辛德勇在《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一文中通過引用大量文獻論證“阜昌石刻《華夷圖》之出於賈耽《海內華夷圖》者，恐怕不惟王國維所說西域、南海諸國的國名而已，其總體形式和構成要素，同樣也是由賈氏此圖漸次蛻變而來，而上述具體演變過程，猶為有助於證實曹婉如過去所說阜昌石刻《華夷圖》‘可以反映賈圖輪廓’”^⑤，此說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需要解決上文在討論《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與《華夷圖》關係時提出的問題，即在賈耽《海內華夷圖》演變為《華夷圖》過程中，為什麼內地的行政建置被不斷的替換為當時的行政建置，而周邊地區依然保存了唐代甚至唐代之前的歷史地名？此外還有“兩浙”的問題。

因此《華夷圖》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很可能與賈耽的《海內華夷圖》並不

存在直接的關係，當然其繪製的資料來源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四、結論

總體而言，《華夷圖》很可能是在《歷代地理指掌圖》早期版本中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基礎上改繪的，其與賈耽《海內華夷圖》之間的關係尚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兩者很可能並無直接聯繫。

中國古代地圖，尤其是全國總圖之間的傳承關係是以往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但一方面從邏輯而言，地圖表面的相似性無法證明地圖之間存在直接影響，而且僅僅是相似本身也是主觀判斷的結果；另一方面與地圖繪製有關的直接文字材料也比較缺乏，我們今天看到的地圖也祇是曾經繪製過的地圖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對於地圖之間關係的研究在方法還有繼續探討的必要，而且作出結論時也要盡可能考慮多種可能性。

注釋：

- ① 曹婉如：《〈歷代地理指掌圖〉研究》，《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31頁。
- ② 曹婉如：《有關華夷圖問題的探討》，《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41頁。
- ③ 孫果清：《歷代地理指掌圖》，《地圖》2004年第6期。
- ④ 《玉海》卷十四“祥符州縣圖經”：“《樂史傳》撰《掌上華夷圖》一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年，274頁；卷十五“太平寰宇記”：“《掌上華夷圖》一卷”，293頁；《宋史》卷三百零六《樂黃目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 ⑤ 何蘧：《春渚紀聞》卷九“趙水曹書畫八硯”，中華書局，1983年，140頁。
- ⑥ 《宋史》卷九十九《河渠志六》。
- 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四“元祐六年”，中華書局，1993年，10884頁。
- ⑧ 《玉海》卷九十一“連屏”，1662頁。
- ⑨ 吳泳：《鶴林集》卷十九，《四庫全書》本。
- ⑩ 李綱：《梁溪集》卷二十四，《四庫全書》本。
- ⑪ 《朱子語類》卷二“理氣下·天地下”，《四庫全書》本。
- ⑫ 如孫果清（《歷代地理指掌圖》，《地圖》2004年第6期）、郭聲波（《〈歷代地理指掌圖〉作者之爭及我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譚其驤（《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⑬ 譚其驤：《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頁。
- ⑭ 同上，3頁。
- ⑮ 曹婉如：《〈歷代地理指掌圖〉研究》，《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31頁。
- ⑯ 郭聲波：《〈歷代地理指掌圖〉作者之爭及我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 ⑰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40頁。
- ⑱ 徐文靖：《禹貢會箋·原序》，《四庫全書》本。

- ① 郭聲波：《〈歷代地理指掌圖〉作者之爭及我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 ② 宋本的自序為蘇軾所作，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的自序則為稅安禮，既然已經認定該書為稅安禮所著，那麼這一自序當歸於稅安禮。
- ③ 費袞：《梁溪漫志》卷六，《四庫全書》本。
- ④ 還可以發現兩者之間一個更為細微的差異，即《太宗皇帝統一之圖》上幾乎所有較大的河流都標注有河名，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大多數河流也標有河名，但卻沒有標注“大渡河”，因此似乎說明《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是以近似於《太宗皇帝統一之圖》的底圖為基礎繪製的，但也有可能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繪製時出現的遺漏，由此上述兩者可能性都存在。不過，這只是基於現存的南宋刻本的分析，不知道之前的版本是否即是如此。
- ⑤ 《華夷圖》中標繪了“大渡河”，不過這並不影響上述的結論。因為這可以解釋為，或更早版本的《歷代指掌圖》中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可能標有“大渡河”；或在以《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為底圖的基礎上還參考了《太宗皇帝統一之圖》。
- ⑥ 如“夏國自唐末拓跋思恭賜姓李氏，宋端拱初賜以國姓，至寶元六年元昊始僭號”；“甘涼五州即漢武時取渾邪、休屠王地置河西四郡，南隔諸羌、據二關斷匈奴右臂以通西域。宋初以來朝貢不絕”等。
- ⑦ 參見辛德勇《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燕京學報》新二十八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9頁。
- ⑧ 辛德勇《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燕京學報》新二十八期，29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